

中共的世界觀與三個世界論的探討

申相振

(國立政治大學政治研究所博士候選人)

一、前言

人類的行爲是人類思想或認知的外顯化。人類的思想和認知，乃是其所處環境的產物，且它提供人類行爲的大方針，對外界的不同認知，乃產生不同的行爲和結果。換句話說，具有不同人生觀的人之間，其行爲表現即有差異。基本上，國際政治體系中國家的行爲，亦可說是它對外認知的外顯化。國家對不同的認知（即不同的世界觀），即產生不同的外交政策。①基於此一理由，研究一國的外交政策時，我們需要詳細了解它的世界觀。

中共領導人認爲，國與國之間關係充滿矛盾。這種矛盾論的世界觀，提供了中共對外政策的重要架構。根據中共的矛盾論，國際體系中存在敵人和友人，而兩者之間存在著永不停止的鬭爭狀態。並且認爲，敵人可區分爲主要敵人與次要敵人。在中共的眼中，爲對抗主要敵人，次要敵人是可聯合的力量。

中共的矛盾論具有動態性。換句話說，隨著國內外環境的轉變，中共對外的認知（矛盾觀）亦有所變化。中日戰爭期間（一九三七至一九四五年），中共認爲，日本帝國主義與中國人民之間的矛盾就是主要矛盾，而中國內部矛盾（國民黨與共產黨間矛盾）是次要矛盾。因此，中共聯合國民黨，來對抗日帝。抗戰勝利到中國大陸赤化期間，國民黨與共產黨之間的矛盾，乃是主要矛盾。中蘇共關係尚未決裂之前，中共接受兩大陣營論，認爲美蘇之間的矛盾是主要矛盾，而採取對蘇一邊倒的外交政策。其後，中共一直主張，帝國主義與亞、非、拉丁美洲地區的被壓迫民族間矛盾是主要矛盾，於是對第三世界國家推動革命外交。一九六九年中蘇邊界武力衝突後，蘇聯社會帝國主義成爲中共的首要國際敵人。在此認知下，爲對付蘇聯對中共的威脅，中共修改過

註① 關於人的行爲與他們對環境的認知之間關係，請參閱Harold and Margaret Sprout, *The Ecological Perspective on Human Affairs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Int'l Politic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 Press, 1965); Dina A. Zinnes, "Some Evidence Relevant to the Man-Milieu Hypothesis," James N. Rosenau, et al. (ed.), *The Analysis of Int'l Politics* (N. Y.: The Free Press 1972), pp. 209-251.

去它對美國和第二世界的認知，進行反蘇統戰策略。

但是，到了一九八〇年代，中共制定三大「國家目標」，積極進行四個現代化。在此情形下，中共遭遇到非常嚴重的難題。一方面，爲了獲得美國、第二世界及蘇聯的援助，中共必須接受舊的國際秩序。另一方面，在第三世界論的理論架構下，爲獲取第三世界國家的支持，中共需要反對舊的國際（經濟）秩序。在此問題意識下，吾人擬討論：(1)三個世界論的發展過程；(2)三個世界論的重要概念及(3)在當前中共三大目標下，三個世界論在中共外交政策中的功用問題。

二、三個世界論的發展

(一)傳統中國人的世界觀

傳統中國人的世界觀與中共的對外認知，兩者之間有否關係？對於此一問題，學者間的看法都有所不同。Lucian W. Pye 和 Robert C. North 等學者主張，當前中共對世界的認知是傳統中國人世界觀之延伸。因此，他們主張，中共對外行爲受到中國傳統文化的影響。②另外，John K. Fairbank 和 Samuel S. Kim 等學者認爲，中共對外認知與傳統中國的世界觀之間存在著根本上的差異。Samuel S. Kim 主張，在中國近代化過程中，毛澤東雖接受傳統中國的許多價值觀，但是中共領導人的世界觀與傳統中國人的世界觀不同。中共領導人的世界觀可歸納如下：(1)以鬭爭代替和諧；(2)以羣衆主義代替精英主義；(3)以平等主義代替階層主義；(4)以國家主權、獨立代替朝貢關係。③

我們都知道，一個國家的政治文化（政治文化一詞，包括人民對國家、環境的感情、評價、態度等主觀心理面）必是持續相當長久的時間，它不能一時之間改變。而當前中共高級領導人物，都出生在共黨意識形態尚未進入中國的時期。是故，包括毛澤東、鄧小平等人多少受到傳統中國的儒教文化之影響。Gabriel A. Almond 等人主張，人的早期經驗對他往後的人格形成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從政治文化的觀點而論，當前中共對外的認知與中國傳統的世界觀之間可能存在一些相同之處。基於如上理由

註② Robert C. North, *The Foreign Relations of China*, 3rd. ed. (North Scituate: Duxbury Press, 1978), p. 15; Lucian W. Pye, *China: An Introduction*, 3rd ed. (Boston: Little, Brown and Co., 1984), pp. 4-5.

註③ Samuel S. Kim, *China, the United Nations, and World Order*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 press, 1979), pp. 91-92。另外，關於主張中共的世界觀與中國傳統世界觀之間存在完全不同的說法，請參見 Benjamin I. Schwartz, "The Maoist Image of World Order," *Journal of Int'l Affairs*, Vol. 21, No. 1 (Winter 1967), pp. 92-93.

，吾人以下首先討論中國人傳統的世界觀。

自古以來，中國處理外面世界時，都是以自己為中心，按親疏遠近的關係來將它判分「階層」的，而這種層次又常常變成一種等級序列。同時，這亦是一種「類型化」的作風。

這種類型化的傾向，從清朝處理對外事務的辦事機關，可明顯的發現。當時，清廷的對外辦事機關有三，即：(1)「禮部」；(2)「理藩院」及(3)「總理衙門」。一般說來，「禮部」是用來處理其他的東亞的農業國家，這些國家的社會條件與中國類似，可以接受儒教文化，因此亦可以「禮」待之。至於蒙、藏的事務則歸「理藩院」處理。這些游牧民族雖然文化水平較低，然而與入關以前的滿族人一樣，都是邊疆民族。因此，遭遇雖不若外國人一般，却可以當自己人看待。當西方人來到中國後，中國人本來把他們當作是來「朝貢」的，但是中國被打敗，而又被不平等條約加諸於身上之後，就不能再把他們看作「藩屬」處理。於是，只得參照現代的國際關係，加多了一個「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結果，就產生了「三個世界」的概念。^④

如上所述，傳統中國人傾向於簡單地將人和國家「類型化」，很自然地對他國形成歧視的態度。中國人既然對自己人也在搞「尊卑有序」、「長幼有序」、「親疏有別」，因此將它延伸到國際關係上，^⑤就出現了上述的「三分世界」的觀念。費正清(John K. Fairbank)亦曾指出，傳統中國處理對外關係時，它一向將外面世界劃分三個不同地區：「中國地區」(Sinitic Zone)、「內亞地區」(Inner Asian Zone)及「外部地區」(Outer Zone)。「中國地區」包括朝鮮、安南、琉球等儒教文化地區；「內亞地區」則是蒙古、西藏等地區，該地區文化上與中國不同(信奉喇嘛教的文化)；「外部地區」則屬於東南亞、南亞及歐洲地區等遠離中國的國家。^⑥清朝時這種三分世界論的依據乃是地理和文化的因素，因此與當前中共對世界的劃分之根據(依照國力大小來劃分世界)不同；但是，清朝對外世界的類型化作風，深深地影響了中共三個世界論的世界觀之產生。

(二)中間地帶論(一九六二年前)

一九二一年中國共產黨出現後，它不斷的提出「矛盾論」，將國內外的體系加以「類型化」，在中共領導人物的眼中，國內

註④ 請見孫隆基，中國文化的深層結構(香港：壹山出版社，一九八三年)，頁三六三。Mark Mancall, *China at the Center: 300 Years of Foreign Policy* (N. Y.: The Free Press, 1984), pp. 16-20.

註⑤ Samuel S. Kim指出，中國人對世界的認知(中華思想)，係國內社會結構中階層原則的延伸。請參閱Samuel S. Kim, *op. cit.*, pp. 21-23.

註⑥ John K. Fairbank, "A Preliminary framework," John K. Fairbank(ed.), *The Chinese World Order: Traditional China's Foreign Relations*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 Press, 1968), pp. 2 and 12-14.

體系和國際體系裏都有「敵人」（敵人又可區分為「主要敵人」和「次要敵人」）和「朋友」。依照這種「矛盾論」的世界觀，中共制定和執行其對外政策。

中共的三個世界論的起源，可追溯到國共內戰時期。日本戰敗後的國共內戰期間，中共在國際上遭遇相當不利的狀況。基於意識形態和道德上的考慮，美國提供龐大的軍經援助給國民黨政府。為了美蘇關係和未來蘇聯國家安全上的考慮，蘇聯亦跟國民黨政府繼續維持關係，而對於中國共產黨只提供極有限的援助。在此不利的國際環境下，為了完成赤化中國大陸的目標，中共迫切需要獲得蘇聯的支持。國共內戰期間（一九四五至一九四八年），中共領導人認為，國民黨與共產黨之間的矛盾，才是主要矛盾。在此情形下，除了中國人民外，蘇聯共產黨和有些中間地帶遂被中共認為是可信的聯合力量。

在此觀念下，一九四六年，毛澤東在和美國記者Anna Louis Strong的談話中，指出：

「美國和蘇聯中間隔著極其遼闊的地帶，這裏有歐、亞、非三洲的許多資本主義國家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美國反動派在沒有壓服這些國家之前，是談不到進攻蘇聯的。」^⑦

在該談話中，我們可看出，當時(1)毛澤東還站在蘇聯一邊；(2)他當然認為，中間地帶國家會說美國是壓迫者；(3)中間地帶只有一個；(4)美國因自己是處在全世界人民的反對中，不能去進攻蘇聯，中間地帶也就成為蘇聯的防波堤；(5)中共當時只有一個主要國際敵人，即美國。

翌年，陸定一在中共黨內部規章中更詳細地指出：美國和蘇聯之間存在遼闊的中間地帶。並主張，該兩超強之間的矛盾不是緊迫的，又不是主要的，而美國與中間地帶的矛盾，才是主要的矛盾。^⑧

上述中間地帶概念，係中共取得政權之前一直堅持下來的基本外交政策架構。中蘇共關係還沒決裂前，許多殖民地國家尚未獲取獨立，並且冷戰為當時國際體系的主要特色。在此國際環境下，「二大陣營論」乃是中共所保持的基本立場。就中共而言，美國就是最大的國際敵人，而蘇聯是它的朋友。中間地帶乃是，為對抗美帝，中共可聯合的力量。^⑨

一九五五年萬隆會議（the Bandung Conference）後，中共對於中間地帶的注意更為提高。該次會議中，周恩來指出：為便利中間地帶國家的統一戰線，需要維持和平共存。另外，一九五六年二月赫魯曉夫（Khrushchev）發表秘密演說後，中共

註⑦ 毛澤東，「和美國記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談話」，毛澤東選集，第四卷，頁一〇八九。

註⑧ Ting-Yi Lu, "Explanation of Several Basic Questions Concerning the first War Int'l situation, L. P. Van Slyke (ed.), *The China White Paper; August 1949*, Vol. 2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 Press, 1967) pp. 713-714.

註⑨ 關於此一觀念，請參閱毛澤東在一九四九年發表的「論人民民主專政」一文。毛澤東選集，第四卷，頁一三五七—一三七一。

以前所堅持的「二大陣營論」逐漸消失。周恩來在第一屆人大第三次會議中又指出：亞、非的國家在國際政治中，逐漸扮演重要的角色。^①一九五八年，毛澤東抨擊北大西洋公約組織（NATO）等美國所建立的軍事同盟體系，並主張其主要攻擊對象不是社會主義國家，而是新興國家。^②從此可看出，在毛澤東的眼中，美國與中間地帶的矛盾為主要的矛盾。在此認知下，中共需要跟中間地帶國家聯合，來對抗美帝。

（三）第一、二中間地帶論（一九六三至一九六八年）

中蘇共衝突的加深和大躍進運動的失敗，使得中共提出「兩個中間地帶論」，以展開國際統一戰線策略。中蘇共衝突的原因很多，其中中共的「大躍進運動」、「臺海危機事件」為主要原因之一。推動「大躍進運動」時期，中共放棄蘇聯模式的經濟計畫，引起蘇聯的不滿。一九五八年臺海危機時，蘇聯沒有積極支持中共，使得中共領導人懷疑蘇聯。一九六〇年，蘇聯撤回所有在中共的蘇聯科技專家，加深了彼此之間的糾紛。

中共大躍進運動的失敗、天然災害及蘇聯停止對中共的援助，促使中共尋求西歐國家的援助。一九六〇年代初期以來，中蘇共間的貿易額急速地下降，反而中共與西方國家間的貿易額逐漸增加。戴高樂執政時的法國脫離美國的外交路線，追求獨立自主的外交政策。是故，法國等西歐國家就成為中共在國際上可爭取的力量。

在如上的國內外環境下，一九六四年一月中共在人民日報的社論中指出：

「這個極其遼闊的中間地帶包括兩個部分：一部分是亞、非、拉丁美洲已經獨立和正在爭取獨立的國家，這是第一個中間地帶；另一部分是整個西歐、大洋洲和加拿大等資本主義國家，這是第二個中間地帶。」^③

這次的中間地帶論已與前次的不同。第一，它已有兩個部分；即有第一和第二之分；第二，社論的標題雖只反美，但文中也指責「蘇聯領導人追求美蘇合作主宰世界」的夢想。因此，這時的中間地帶論已具有反美反蘇的雙重意義。在此時期，中共成

註① "On Present Int'l System, China's Foreign Policy, and the Liberation of Taiwan: An Address by Premier and Foreign Minister Chou En-lai to the Third Session of the First National People's Address, June 28, 1956," *People's China*, No. 14 (July 16, 1956), Supplement, p. 3.

註② Mao, "Supreme State," *Mao Does I*, Sep. 9, 1958, p. 245. 轉引 Young-mun Kim, *Chinese Foreign Policy toward the Third World in the 1970's: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the Three Worlds* (Ph. D. Dissertation, Univ. of Calif. Riverside, 1979), p. 44.

註③ 人民日報，一九六四年一月二十一日社論。

爲國際革命勢力，支持亞、非、拉丁美洲的民族解放運動。另外，爲了開拓它與中間地帶的關係，中共時常對蘇聯提出反對態度（特別是蘇聯第二十次共黨大會以後）。⑬

在此階段，中共雖然追求「雙重敵人」的戰略，⑭但是它仍認爲，美帝與亞、非、拉丁美洲被壓迫民族間的矛盾爲主要矛盾。⑮當時，中共極力支持民族解放運動，希望得到民族解放運動勢力對於反帝國主義和反現代修正主義（蘇聯）統一戰線的支持。

一九六五年，林彪發表「人民戰爭勝利萬歲」一文，其中指出：

「從全世界範圍看問題，如果說北美、西歐是『世界的城市』，那麼，亞洲、非洲、拉丁美洲就是『世界的農村』……今天的世界革命，從某種意義上說，也是一種農村包圍世界的城市之形勢。整個世界革命事業，終究要以占世界人口絕大多數的亞洲、非洲、拉丁美洲的人民革命鬥爭爲轉移。社會主義國家理應把支持亞洲、非洲、拉丁美洲的人民革命鬥爭當成自己的國際主義責任。」⑯

在上述一文中，林彪主張民族解放鬥爭的重要性，並提出以農村（亞、非、拉）包圍城市（北美和西歐）的統一戰線構想。在此，中共主張，自己是世界的農村，與亞、非、拉丁美洲國家站在一邊。

（四）三個世界論

一九六八年蘇聯入侵捷克，使得中蘇共關係陷入敵對關係。蘇聯干涉捷克內部自由化運動，並宣佈社會主義國家的「有限主權論」。中共認爲，該事件的結果，蘇聯爾後很有可能介入中共內政問題。在雙方關係惡化之下，翌年發生了中蘇邊界衝突事件，更加深彼此間的糾紛。這些事件發生後，中共就很明顯地把蘇聯推向帝國主義一邊，中共進行「三反」外交。這時，中共的國際統一戰線就成爲反美反蘇統一戰線。

在上述國際環境下，中共內部出現兩個派系，即：(1)以周恩來爲首的實用主義派和(2)以林彪爲首的革命派。⑰周恩來等實用

註⑬ *Peking Review*, No. 25(June 21, 1963), pp. 15-16.

註⑭ Young-mun Kim, *op. cit.*, p. 52.

註⑮ 林彪，「人民戰爭勝利萬歲」，紅旗，一九六五年第十期（一九六五年九月），頁二一。

註⑯ 同註⑮，頁一〇。

註⑰ Han Suyin, *Wind in the Tower: Mao Tse-tung and the Chinese Revolution, 1949-1976* (Frogmore, St Albans: Triad/Panther Books, 1978), pp. 356-366.

主義派主張，改善中（共）美關係，以施加壓力於蘇聯。林彪所領導的革命派則主張，中共對美帝和蘇聯社會帝國主義採取雙重敵人政策，而反對改善與美國的關係。

由於林彪派的勢力較大，故中共取消中（共）美大使級談判。並且，林彪在第九屆黨大會中被任命為毛澤東的繼承人。在此情形下，中共對外採取「雙重敵人」政策，即中共反對美帝和蘇聯社會帝國主義。到一九七一年初，林彪的勢力逐漸降低；在此國內環境下，為了牽制蘇聯，中共才對美國開始採取友好的政策。

如上中共領導人對國際環境的認知之變化，深深地影響到中共的「矛盾論」。一九六九年四月，中共召開「九大」，林彪提出四大矛盾：(1)被壓迫民族與帝國主義、社會帝國主義間矛盾；(2)資本主義、修正主義國家內部的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間矛盾；(3)帝國主義國家與社會帝國主義國家的矛盾，及帝國主義國家間的矛盾；(4)社會主義國家與帝國主義、社會帝國主義國家間的矛盾。^⑭其中，中共認為，被壓迫民族與帝國主義、社會帝國主義間的矛盾為主要矛盾。林彪的勢力降低後，中共主張，被壓迫民族與社會帝國主義（蘇聯）之間的矛盾為主要的矛盾。中共遂認為，蘇聯是它最大的敵人。蘇聯對中共安全上的威脅，使得中共修正它對美蘇帝國主義的態度。

在中共如此的世界觀之下，中共需要建立一個廣大的國際統一戰線，以對付兩超強對世界的控制企圖。當時，中共的統戰對象包括第二世界和第三世界國家。其中，第二世界的重要性逐漸提高。一九六〇年代，中共認為，日本和西歐國家屬於美國集團，甚至是美國的走狗；並認為，它們皆為世界的城市。但是，到了一九七〇年代，第二世界國家在中共的眼中是重要的統戰對象。

中共的所謂三個世界論，一九七四年鄧小平在聯大特別會議中正式提出如下：

「從國際關係的變化看，現在的世界實際上存在著互相聯繫又互相矛盾的三個方面、三個世界。美國、蘇聯是第一世界。亞、非、拉發展中國家和其他地區的發展中國家，是第三世界，處於這兩者之間的發達國家是第二世界。」^⑮

上述三個世界論，明顯地由「第一、二中間地帶論」發展而來的，所謂第二世界就是第二中間地帶，而第三世界乃是第一中間地帶。中共主張，因出現蘇聯社會帝國主義，社會主義陣營已不復存在。在上述演說中，鄧小平並沒有提起蘇聯以外共黨國家屬於那一世界。^⑯他強調，第三世界國家在國際上越來越重要。中共強調自己屬於第三世界。這種中共的世界觀，就成為爾後中

註⑭ Lin Biao, "Speech to the Ninth Congress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Peking Review* No. 18 (Apr. 30, 1969), p. 31.

註⑮ John Y. Lin (ed.), *中共對美策略重要文件彙編*，卷一（臺北：中國問題研究出版社，出版年度不明），頁四二。

註⑯ 中共認知，如果它把東歐的共黨國家區分為第三世界，這可能帶來意識形態的純粹問題；並假如中共把它們分為蘇聯的走狗（即第一世界），中共的國際統戰上產生不利的影響。所以，中共故意避免提起東歐和其他地區共黨國家。

共對外政策的重要架構。一九七七年人民日報中指出：三個世界論是毛澤東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主要貢獻，並誓約堅守毛澤東的革命外交路線。^②十二大黨大會時，中共設定八〇年代的三大目標，即：(1)四化；(2)統一及(3)反霸。一九八〇年代，中共繼續主張，自己是第三世界國家的一員，指責美蘇霸權國家。由此可見，雖然隨國際環境的變化，中共的三分之一世界論有所變化，但它仍是中共對世界之認知的重要架構。^②

三、三個世界論的重要概念

(一) 國際統戰策略

中共的統戰策略，係自它的革命經驗中學習而得的。爲了瞭解中共外交行爲，我們首先需要知道中共的國際統戰策略。中共的三個世界論，就是根據世界的矛盾而形成的國際統戰策略。如前章所述，隨著時間、環境的變化，中共對世界的認知亦有變化；進而，中共的矛盾觀念亦有所變化。在此不同的的矛盾觀之下，中共的國際統戰對象和策略也隨之變化。

中共的國際統戰策略的特徵，可歸納如下五項：(1)其目標爲對付一個敵人（主要敵人）；(2)爲對付該敵人，企圖聯合許多不同的勢力；(3)將主要勢力區分爲進步勢力、中間勢力和反動勢力，而後爭取中間勢力，加強進步勢力，以對付反動勢力；(4)以「聯合和鬭爭」作爲其行動策略。^②中共設定一個主要敵人，其理論根據是毛澤東的矛盾論。根據該矛盾論，中共需要形成一個國際統戰策略，其統戰對象包括次要敵人和朋友。

中共統戰策略的主要目的，包括對抗主要敵人和統一戰線內部權力分配的改變。聯合與鬭爭爲統戰的主要方法。統一戰線的主要目的，乃是爲對抗主要敵人而聯合可利用的勢力。但是，統一戰線不排除統戰內部勢力間的鬭爭。中日戰爭期間（一九三七至一九四五年），中共認爲，日帝是主要敵人，而國民黨爲次要敵人。在此認知之下，中共一方面與國民黨建立統一戰線（「聯

^② 人民日報，一九七七年十一月一日，轉自Herbert S. Yee, "The Three World Theory and Post-Mao China's Global Strategy," *Int'l Affairs*, Vol. 59, No. 2 (Spring 1983), p. 240.

^② 隨著國際環境的變化，中共對三個世界論的解釋和適用亦有所變化。大致上說，一九七四至一九七八年間中共追求革命外交路線；其後，一九七八年底開始，中共爲了對付蘇聯社會帝國主義，聯合第二、第三世界和美國；一九八二年以降，中共採取獨立自主外交路線，強調第二世界和第三世界的重要性。關於中共三個世界論概念的變化，請參閱Ibid., pp. 239-249.

^② Young-Mun Kim, *op. cit.*, pp. 60-61.

合」)，對抗日帝，另一方面它與國民黨進行「鬭爭」（即改變國民黨與共產黨之間權力平衡狀態）。

隨著中共所認知的環境（psychological environment）的變化，統戰策略亦有所變化。歷史上，中共的統戰策略可區分兩種：(1)林彪模式（中共企圖利用農民、工人同盟，推翻資本主義政府，即革命輸出）；(2)鄧—華（國鋒）模式（企圖與特定的政府和國家聯合，對抗更危險的帝國主義）。②在不同的環境，中共採取不同的統一戰線模式。

一九七〇年代開始，中共逐漸認為，蘇聯是世界和平的最大敵人。在此認知下，中共可暫時與美國聯合，對付蘇聯霸權主義。但是，中共不排除它與美國之間的統戰內鬭爭。正如黃華所說，美國是統戰的一部分，但它仍是反動勢力。③到一九七〇年代末期，中共攻擊越南，但無法達到它所預期的結果。該次的人民戰爭失敗後，中共深深地覺悟現代武器的必要性。在此情形下，中共企圖改善與美國和第三世界國家的關係，希望得到它所需要的支持。當時，中共對第三世界繼續保持莫大的關心。

到一九八〇年代，中共對世界戰略的看法有所改變。中共認為，當中蘇共之間發生軍事衝突時，美國可能只提供中共極有限的援助。為了實現四個現代化的目標，中共需要和平的國際環境，故它希望跟蘇聯維持友好的關係。其次，美國對臺灣的軍售，亦影響中共的國際統戰策略。換句話說，中共不願為了跟美國共同對抗蘇聯而犧牲自己的利益。

在此認知下，中共採取獨立自主外交政策，加強對第三世界和第二世界的關係。中共主張，美蘇為追求霸權的國家，而採取雙重敵人的政策；為對付霸權，中共對第三世界展開統戰外交。但是，這種統戰策略本身具有其限制。因為中共為了實現四個現代化目標，仍需要美、蘇及第二世界等國家的援助。基於此一理由，中共雖一再強調國際統戰策略在中共外交政策中的重要性；但是，嚴格的說，現階段中共的統一戰線已逐漸喪失過去那樣重要的地位。中共對第三世界的政策只是「口號」，而不是一「現實」。

（一）第一世界

鄧小平在聯大特別會議上的發言中，將第一世界的概念界定如下：

「美國和蘇聯兩個超級大國（第一世界），妄圖稱霸世界。它們用不同的方式都想把亞、非、拉的發展中國家置於它們各自的控制之下，同時還要欺負那些實力不如它們的發達國家。……它們都對別國進行經濟剝削，掠奪別國的財富，攫取別國的資源。在欺負人方面，打著社會主義旗號的超級大國尤為惡劣。」④

註② Lyman P. Van Slyue, *Enemies & Friends: The United Front in Chinese Communist History* (Stanford: Stanford Univ. Press, 1967).

註③ Young-Mun Kim, *op. cit.*, p. 67.

註④ 「鄧小平在聯大特別會議上的發言」，中共對美策略重要文件彙編，卷一，頁四二。

中共認為，第一世界是國際剝削者和壓迫者。第一世界對第三世界的經濟剝削的結果，第一世界擁有龐大的資產，用以擴張其軍事力量。所以，第一世界很可能成爲新的世界戰爭的策源地。中共主張，美國通過「跨國公司」等組織，經濟上掠奪第三世界國家，政治上進行干涉小國。蘇聯亦是以軍經援助的名義，干涉第三世界國家的內政，剝削第三世界的經濟。

中共又認爲，美蘇兩超強追求霸權，而其他國家乃是該超強追求世界霸權中的犧牲品。從中共的觀點而言，霸權主義必定會導致世界大戰。因此，中共主張，「兩個超級大國是當代最大的國際剝削者和壓迫者，是新的世界戰爭的策源地。」^②毛澤東亦曾主張：超強之間可以達成協定，但是它不可能維持長久的時間。超強之間存在難以解決的衝突。因此，超強之間的戰爭是不可避免的。^③

基於如上原因，中共主張，組成包括第二世界和第三世界的國際統一戰線，以對抗兩個超級強國。一九七〇年代，中共形成統一戰線的主要目標爲反對蘇聯社會帝國主義。中共認爲，美國的勢力逐漸在下降，而蘇聯的勢力相對的在提高。在此認知下，中共遂認爲蘇聯社會帝國主義是世界和平的最大敵人，爲對付蘇聯社會帝國主義（主要敵人），中共可以與美國（次要敵人）建立統一戰線。爲此，一九七九年一月，中共與美國建立正式外交關係，共同對抗蘇聯的擴張主義。

但是，到一九八〇年代，中共對兩超強的認知有所變化。中（共）美關係正常化後，美國對臺灣繼續提供軍事方面的援助，使得中共必須慎重考慮它對美國的政策。另外，一九七〇年代中共採取親美政策之結果，許多不結盟國家表示不滿。在此情況下，布里茲涅夫發表塔什干（Tashkent），引起中共的共鳴。目前，中共對美蘇採取等距的外交政策。雖然中共一再主張美蘇爲霸權，但是美蘇兩國在中共外交政策中具有最大的重要性。

（三）第二世界

第二世界由西歐、澳洲、加拿大及日本等已發達國家組成。中共認爲，爲了對抗霸權，第二世界可與第三世界聯合。因爲它們都在受著超級大國的控制、威脅和欺負。^④

一九七〇年代以降，西歐和日本的經濟力量逐漸擴大，隨之它們在國際政治中的影響力亦有相當的提高。到一九七〇年代，

註② 同註①。

註③ Editorial Department of People's Daily, *Chairman Mao's Theory of the Differentiation of the Three Worlds is a Major Contribution to Marxism-Leninism* (Peking: Foreign Languages Press, 1977), p. 66.

註④ 中共對美策略重要文件彙編，卷一，頁四一。

中共的世界觀與三個世界論的探討

因受越戰的影響，美國在國際經濟上的領導地位受到西歐、日本等國家的挑戰。在此情況出現後，西歐和日本等第二世界國家可採取較自由的政策。於是，中共可聯合這些第二世界國家後，以對付美蘇霸權國家。

其次，從中共的軍事戰略上看，西歐（尤其是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蘇聯在東歐部署大約三十個師的兵力（不包括華沙公約組織的五十五個師）。^② 歷史上和地理上，蘇聯是歐洲國家，所以它在東歐必須維持大規模的兵力，以防衛它在東歐地區的安全。從此一觀點看，西歐可能成爲中共的軍事夥伴，共同對付蘇聯的威脅。如果出現軍事上強大的西歐，蘇聯在東歐地區必須部署大規模的兵力。如此，蘇聯對中共的軍事威脅就可能降低。因此，西歐等第二世界在中共的國際統戰中，具有頗大的重要性。

經濟上，西歐、日本等第二世界對中共相當重要。中共進行現代化目標當中，需要龐大的資金和高科技。除美蘇第一世界外，第二世界國家可說是唯一可靠的對象。一九八〇年代，中共與第二世界國家的貿易量大幅的增加（見表1），這一事實表示第二世界在中共外交中具有重要性。另外，爲擺脫美蘇對中共的影響力，中共亦需要跟第二世界加強經濟關係。

當前，日本已成爲世界上第二經濟大國，隨之它在國際社會中的影響力也大幅提高。尤其，日本在亞洲經濟體系中的重要性非常之大。在此情況下，爲對付蘇聯在亞洲的擴張勢力，中共需要拉攏日本。一九七二年，中（共）日兩國建立正式外

表1 中共對外經濟關係（一九八二～八六年）

單位：百萬美元

年 度	一九八二年	一九八三年	一九八四年	一九八五年	一九八六年
香 港	7,385 (18.1%)	8,342 (19.2%)	12,162 (23.5%)	15,426 (22.2%)	18,010 (24.4%)
日 本	8,862 (21.7%)	9,999 (23%)	13,173 (25.4%)	18,959 (27.2%)	15,520 (21.0%)
美 國	5,414 (13.2%)	4,650 (10.7%)	6,385 (12.3%)	8,080 (11.6%)	8,346 (11.3%)
西 德	1,555 (3.8%)	1,843 (4.2%)	1,889 (3.6%)	3,101 (4.4%)	4,067 (5.5%)
義 大 利	638 (1.6%)	679 (1.6%)	873 (1.7%)	1,390 (2.0%)	1,684 (2.3%)
英 國	518 (1.3%)	595 (1.4%)	796 (1.5%)	987 (1.4%)	1,406 (1.9%)
法 國	773 (1.9%)	833 (2.0%)	750 (1.4%)	1,280 (1.8%)	1,249 (1.7%)
加 拿 大	1,186 (2.9%)	1,514 (3.5%)	1,251 (1.9%)	1,255 (1.8%)	1,204 (1.6%)

資料來源：The China Business Review, Vol. 14, No. 3 (May-June 1987), p. 33.

交關係；一九七八年，締結「中日和平友好條約」，其中規定了反霸條款，雙方形成反蘇統一戰線。

四 第三世界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後，第三世界經歷很大的變化。亞、非、拉丁美洲的許多國家進行民族解放、反帝及反殖民主義鬭爭，而獲得獨立。雖然這些國家已獲得獨立，但它們仍沒有達到真正的政治、經濟上的獨立。帝國主義國家對第三世界進行經濟剝削、掠奪財富、攫取資源。它們以「互賴理論」(interdependence theory)的名義，^②剝削第三世界。

雖然如此，從中共的觀點看，由於第三世界國家民族主義的興起和互相團結，帝國主義的影響力將會減少。中共認為，大部分第三世界國家是反對殖民主義和帝國主義的力量。因此，這些第三世界就是中共可聯合對付霸權的主要勢力。為爭取這些國家的支持，一九六〇年代以來中共一直自稱為第三世界國家，並提供軍事、經濟、文化等方面的援助給第三世界國家。第三世界組成區域組織，加強互相關係；並在美蘇對立中維持獨自的立場，提高其在國際政治中的地位。這種現象，使得中共領導人更加重視第三世界在中共外交政策中的地位。

但是，一九七〇年代以後，中共對第三世界的革命輸出逐漸減少。中共提倡新的口號：「國家需要獨立，民族需要解放，人民需要革命」。^③從該口號中，我們可看出，中共較重視國家獨立，而把革命的比重放在最低。中共所認為的國家獨立，乃是第三世界在美蘇帝國主義鬭爭中維持獨立自主的立場。中共把第三世界看成為反帝統戰的朋友。除此之外，第三世界在對臺統戰上，亦具有重要地位。但是，就中共「國家利益」而言，美蘇具有最重要的意義，而第三世界就不那麼重要了。因此，目前中共對第三世界支持的只是「口號」而已。

四、中共外交目標與三個世界論：代結語

大致上，中共外交政策目標可歸納為：(1)維持國家安全；(2)提高國家力量(包括四個現代化)；(3)達成國家統一及(4)完成無產階級世界革命。其中，無產階級世界革命為中共所追求的長程目標。另外的三項目標為中共現階段所追求的短期或中期目標。中共的長程目標，即無產階級世界革命，係持續不斷的目標。雖然一九八〇年代以後它的意義逐漸消失，但是中共的短程目標和

註② 關於依賴理論，請參閱Robert O. Keohane and Joseph S. Nye, Jr., *Power and Interdependence: World Politics in Transition* (Boston:

Little, Brown and Co., 1977)。關於「發展理論」，請參閱Samir Amin, *Accumulation on a World Scale: A Critique of the Theory of Underdevelopment* (N.Y.: Monthly Review Press, 1973)。

註③ *Peking Review*, No. 19 (May 7, 1971), p. 6.

中程目標，按照其內外環境的要求，可能作為適當的調整。^③

因一九六〇年代末期以來內外環境的需求，中共制定三個世界論，處理其對外事務。依照三個世界論的世界觀，蘇聯乃是中共安全上的最大敵人。一九七〇年代，除中蘇邊界地區外，蘇聯在中共的周圍（越南、印度、西南亞地帶）加強其軍事力量，企圖包圍中共。相反的，美國却發表新亞洲政策，自越南撤軍，使得中共改變過去對美的強硬政策。是故，蘇聯已成為中共安全上的最大威脅者。基此安全上的考慮，中共需要尋找支持力量（諸如，美國、第二世界和第三世界）。另外，中共為維持其內部政治秩序，宣佈結束文化大革命，俾便對外採取積極的政策。在如上環境下，中共企圖形成反蘇國際統一戰線。但是，在一九八〇年代，中共對美蘇採取「又是敵人，又是朋友」的政策；為確保其「國家利益」，中共希望拉攏兩超強。

另外，「國家現代化」亦是中共的主要目標之一。一九七七年中共在人民日報中曾登載「毛主席的三個世界論」一文指出：「中國人民強烈要求和平，而反對新的世界大戰。面對加速社會主義建設和農、工、國防及科技現代化等偉大目標下，我們中國迫切需要長期的和平。」^④在中共的眼中，蘇聯乃是挑起世界大戰的主要國家；是故，蘇聯是中共追求四個現代化目標中的障礙。但是，在一九八〇年代，中共希望改善與蘇聯的關係，以維護周圍的和平，為其達成四化目標而鋪路。

達成中共長程目標的途徑裏，美蘇兩國皆為障礙因素。中共主張其為純粹的社會主義，而蘇聯是不純粹的社會主義國家。美蘇兩國同為帝國主義國家，並同屬於世界的城市。為完成無產階級世界革命，中共需要聯合第三世界的力量，共同打破帝國主義。為此，一九八二年以來，中共正式採取獨立的外交政策，強調第三世界的重要性。^⑤其後，中共領導人頻繁的訪問第三世界國家，展開統戰策略。但是，當前中共領導人認為，社會主義現代化和國家安全目標比無產階級世界革命還要迫切需要。另外，當中共與超強間發生衝突時，第三世界過去沒有積極公開的支持中共的立場，加上第三世界組織——像七七集團（Group of 77）、不結盟國家等——的團結程度不高，所以它在國際政治中無法發揮強大的影響力。

基於如上觀點，第三世界對中共的重要性並不大。因此，中共不願第三世界國家的反對，接受舊的國際經濟秩序，並且它與美國、蘇聯等第一世界逐漸改善關係。總之，在當前國際環境下，三個世界論的世界觀將逐漸喪失其本來的地位。因為中共外交行為一向（甚至在革命外交時期）是注重其「國家利益」。

註③ Allen S. Whiting, "Foreign Policy of China," Roy C. Macridis (ed.), *Foreign Policy in World Politics*, 6th ed., (Englewood Cliffs, N. J.: Prentice-Hall, 1985), pp. 271-280.

註④ Editorial Department of *Peoples Daily*, *op. cit.*, p. 65.

註⑤ John F. Copper 主張，雖中共一九八二年以來強調第三世界在它外交政策中的地位，但這種主張仍屬於「口號」而已。他並主張，在目前蘇聯對中國安全上的威脅，以四化作為首要目標的前提下，中共對第三世界很難給予龐大的支持和援助。John F. Copper, "The PRC and the Third World: Rhetoric and Reality," *Issues & Studies*, Vol. 22, No. 3 (March 1986), pp. 111-113.